试论满文文献特征

郭孟秀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有清一代留下的大量满文文献, 包括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 真实记载了满族从勃兴、发展到繁荣的历史过程, 不仅是中国历史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研究满族历史、清史和东北地方史的珍贵史料。满文文献, 作为一种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记录符号的历史文献, 具有与其他文献迥异的特征。本文就满文文献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特征予以概要论述。

关键词: 满语文; 文献; 特征
中图分类号: G257.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365X(2003)04- 0073- 06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征之矣。"其中"文"是指"典籍", 即历史典籍等文字资料; "献"是指"贤", 即贤能的人[①]。还有学者认为"献"是指贤人的传议论。[②]这是文献的最初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文献一词的意义逐渐向"文"偏移,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一般是指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和[③], 而且是以文字符号记录的一切社会史料的总和, 包括早期的甲骨文文献、金文文献, 稍晚的简帛文献、石刻文献及纸质文献, 也包括出现不久的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等, 这是广义上所指的文献。狭义上的文献通常指以纸张为载体的文献。满文文献就是指用满语文书写的所有史料, 包括著译、档案、谱牒、碑刻等不同载体的文献。本文所论述的满文文献主要是指著译类文献, 亦即狭义上的文献。由于满文档案其数量浩繁, 价值甚高, 已有众多学者专门论述, 本文不复赘述。

通常来说, 一种文献的特征在宏观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 即: 形式特征与内容特征。形式特征主要指文献的载体形态特征如质地、版本、装帧、开本、页码等, 以及所使用的语言; 内容特征主要指文献所记录的内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献都有着异于其它类型文献的特征。满文文献, 作为一种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记录符号的历史文献,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与其他文献迥异的特征。本文拟就满文文献的两方面特征予以概要论述, 舛误不当之处, 尚请方家正之。

一、满文文献的形式特征

满文文献的形式特征一方面体现在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所具有的在版本、开本等载体形态上的特征,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少数民族语文文献, 体现了该语文的一些特征,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满文文献版本类型丰富多样

版本原指雕刻木版印刷的书本,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 版本是描述书籍的一个重要指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

标。这与现代版本所指的“异本”是有所区别的。就纸本文献而言,版本类型大致可分为写本、刻本、套印本、活字本、石印本、善本、珍本等多种。其中写本与刻本较为常见。写本又称抄本,包括手稿本(作者亲笔所写),清稿本(多为他人誊写作者原稿又经作者添改)[④],抄本(未经作者过目,更无作者笔迹)[⑤]等。刻本,其分类因角度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按时代可分为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等,按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现存的满文文献,版本类型十分丰富,不仅有刻本,抄本,而且还有木活字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刻本中有殿刻本、官刻本、房刻本等类型,其中武英殿刻本(简称殿刻本)居多,特别是在雍乾两朝撰修翻译的典籍多为殿刻本。如,康熙四十七年的《御制清文鉴》(殿刻本),雍正三年的《钦定吏部则例》16册47卷,雍正十年尹泰等撰的《大清会典》,乾隆四年的《大清世祖章皇帝圣训》6卷本,乾隆三十七年刘统勋等撰的《大清律纂修条例》等[⑥]。此外,还有一部分官刻本和坊刻本。如,康熙二十九年伊桑阿等撰的162卷本《大清会典》(内务府刻本),雍正三年的《钦定吏部铨选满官则例》(内和府刻本),而《清文汇书》有多种坊刻本,如康熙年间的京都四合堂刻本,乾隆十六年的英华堂刻本,中和堂刻本,嘉庆二十年的四合堂刻本等。满文文献的写本有精写本、写本、钞本多种形式。精写本数量不多,但史料价值颇高,主要是政治类文献和与皇帝相关的文献。如《礼部则例》、《太常寺则例》、《玉牒》。有的实录还有多种精写本,如《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现存有大、小红绫精写本和小黄绫精写本,《大清世祖章皇帝圣训》有大红绫包背蝶装精写本、小红绫精写本和小黄绫精写本。[⑦]一些学习用书、文学类及民族、民俗类(谱书)文献则以抄本为多,如《翻译指南》、《四部成语》、《钦定清文鉴》、《尼山萨满》、《唐代演义》、《佟氏宗谱》、《塔他拉氏族谱》等。

清满文文献版本的丰富多样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是清政府的鼓励政策与积极的态度。尽管在清康熙初年曾严禁私人刻书,但这主要是针对汉文典籍,而对满文文献不仅少有限制,而且是大力倡导。在清开国之初(1629年)便设立文馆,翻译汉文书籍,并记注本朝得失。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顺治十五年(1658年),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兼管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等修书馆。除了这些长开的修书馆外,还有例开的修书馆,如实录馆、玉牒馆,每届修书时开馆,书成后即闭馆;特开的专为修某书而开的修书馆,如明史馆、会典馆、文颖馆等。[⑧]其次,受益于中国版本学累年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是雕版印刷以至活字印刷的诞生地,自隋唐之际印刷术的发明,历经宋、元、明各代的发展与完善,至清代达到极盛,清精刻本已被视为艺术精品。[⑨]满文文献在印制时自然要利用版本发展的丰硕成果,而丰富起来。对于坊刻本与家刻本尤其如此。此外,清代繁荣兴盛的学术成就,特别是至乾嘉达鼎盛的考证校雠之学,为满文文献版本的丰富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2. 满文文献的开本尺寸大小不一

从目前有关介绍满文文献的目录中可以看出,满文文献的开本尺寸大小不一,规格多达数百种。在《世界满文文献目录》与《满文文献目录》中具有严格一致开本文献十分有限。即使是同一刻抄部门,因刻本时间不同,尺寸也有所区别。如殿刻本的开本就有多种规格:24.4×17CM(《大清太祖高皇帝圣训》1686年),(23.5×17.2CM(《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

1807 年), 22×17CM (《太清仁宗皇帝圣训》1824 年)。[10] 在辽宁图书馆收藏的满文文献中, 情况也是如此。如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的 《同文广类全书四卷》(刘顺金陵听松楼刻本》 "半叶版框高 20. 8 厘米, 宽 14. 8 厘米 "; 康熙四十五年的 《满汉类书三十二卷》(天绘阁书坊刻本) "半叶版框高 20. 5 厘米, 宽 13. 4 厘米 "; 康熙五十六年的 《御制清文鉴二十卷》(武英殿刻本) "半叶版框高 21. 7 厘米, 宽 16. 6 厘米 "。[11] 除刻本外, 写本的开本尺寸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差异也不是很大, 高度大多都在 20—25 厘米之间, 宽度多在 13—18 厘米之间。

造成开本大小不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刻书机构繁多, 各自标准不统一。清官府刻书机构主要有武英殿修书处、内务府御书处、国子监与官书局。武英殿修书处隶属内务府, 初为武英殿造办处, 康熙十九年(1680) 设, 雍正七年(1729) 改为武英殿修书处。掌刊印书籍各项事务。御书处初为 "文书馆 ", 康熙二十九年(1690) 改为是称。设有刻字作、裱作、墨刻作及墨作。道光二十三年(1843) 归并武英殿修书处。尽管二者均属内务府, 但各设职官, 互相没有管理或从属关系。国子监主要刊刻皇帝 "御论 " 颁发在京各衙门官学及各省儒学学习。清代家刻借强盛的私家藏书之风气而相当繁荣, 坊刻略弱, 但在北京、南京、苏州比较集中。[12] 各刻书坊、家均有自己的风格, 在开本上也就纷纭多样。加之, 当时并没有统一的开本标准, 差异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满文刻本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调整之中。在清代前期刻书盛行软体字手写上版的 "写刻本 "。在清代中期, 考据学风如日中天, 所以刊刻书籍特别注重校勘, 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满文文献刊刻时开本尺寸的统一。

3. 满文文献中语言文字演变特征明显

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 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 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 因草创的满文无圈点, 故被后人称为 "无圈点满文 " 或 "老满文 "。老满文在满足满族人民之间交际的需要、推动满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巩固统治地位服务等方面, 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草创的老满文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与不足, (老满文) "十二字头, 原无圈点, 上下字无别, 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 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 视其文义, 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 必致错误。"[13] 改革老满文已势在必行。天聪六年(1632) 三月前, 达海受命完成了对老满文的改制。改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在一些 '老满文 " 字母旁添加圈(。)、点(·) , 使之与原来字母不再雷同, 做到一字一音; 二是规范字体, 划一书写形式, 消除了原来一字多种书写形式的混乱现象; 三是创制特定字母, 增加了原来没有的语音, 解决了拼写外来借词的需要; 四是创制满文字母的连写切音形式, 解决了对一些人名、地名、官名等音译易错的问题 "[14]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 "新满文 " 或 "有圈点满文 "。由此可见, 新满文与老满文无论在拼写上、书写上还是读音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新满文作为一种语言文字更为完善。满语文由创制到改革的完成, 前后经过三十多年, 在满文文献中体现了这一发展演变过程。此外, 作为一种语言文字, 满语文在随后 200 多年的使用中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 但这都属于语言的自然演变, 是一种渐变过程, 在整体上也没有由老满文到新满文的变革这样巨大和明显, 因此, 这里不将其作为重点论述。

由于老满文是自上而下创制的, 加之通行时间不长(仅有 30 多年), 其应用推广范围仍是有限的。主要是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人以此作为彼此交流的工具, 努尔哈赤和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

皇太极发布政令、接转各地军政情报, 官员记注国政, 以及一少部分学者翻译汉文典籍等。所以现存老满文文献并不太多, 其中以《满文老档》为代表。《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 是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前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各种活动的官方记录。其记录的内容, 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 止于明崇祯九年(1636 年)。"是用草创的无圈点老满文与改进后的半圈点的过渡阶段的满文书写, 文字古老, 记述多用口语, 句型简短, 结构不严谨, 语法不规范, 夹书蒙语与汉语借词, 其中许多语词在清入关后已被淘汰。"[15]

虽然在《满文老档》中使用的既有老满文(自丁未年至天聪六年三月 1607—1632), 也有改制后的新满文(1632 年 3 月后), 但即使是新满文也因其用法极不规范而与后来通行的满文相去甚远, 以至于在清朝乾隆时期已很难认读。这是一种语言文字由改革到能够被良好地使用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也可以说明, 1632 年改制后的新满文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步改革到日趋成熟完善的过程。而满文在全国通行使用则是在顺治元年(1644 年)多尔衮挥师入关之后。因此, 满文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599 年至 1632 年, 老满文时期; 1632 年至 1644 年, 新老满文更替过渡时期, 或称为新满文初期; 1644 年以后, 成熟的(新)满文时期。当然, 这一分期不是绝对的。因为满语文是自上而下创制、改革而推广使用的, 文献的产生有时与语言文字的改革是同步的, 加上地域远近不同, 政令接收时间也有差异, 因此这只能是大致的分期, 不排除一些例外的情况, 但满文文献中前后语文的差异的确是其一个明显特征。

4. 满汉、满蒙等多语言合璧文献占有相当数量

满语文同其他语种合璧文献占有相当数量是满文文献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在《世界满文文献目录》的"政治"类 73 种文献中, 满汉合璧 24 种, 满蒙合璧 3 种, 满蒙汉 3 种。合璧文献约占总数的 41%。政治类文献是合璧文献较少的一类。在"军事"类 79 种文献中, 满汉合璧为 38 种(其中一种为满汉对照), 占总数的 48%。而在"语文"类中的"语音与文字"小类 42 种文献中, 满汉合璧为 28 种, 满蒙汉 1 种, 占总数高达 69%。[16]

据不完全统计, 合璧文献应占满文文献总数 50% 左右, 其中满汉文献为最多, 其次为满蒙和满蒙汉, 再次为满蒙汉与满蒙汉藏合璧文献, 还有一些为与其他语言合璧文献。在民族、宗教等涉及其他民族的文献中则多为几种语言的合璧文献。有的一种文献中多达 5、6 种语言, 如傅恒等纂的《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殿刻本), 为满汉蒙藏托忒蒙维吾尔合璧。[17] 除了上述语言外, 还有西番语, 如《大藏全咒》(满汉蒙西番合璧, 乾隆三十八年殿刻本); 梵语, 如《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分类, 初稿本)。[18]

如此之多的多语种合璧文献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不多见的。但结合文献产生社会与历史背景, 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刻历史原因。首先, 在 1644 年满族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入主中原后, 其所要统治的主体民族是汉民族。为了加强统治与管理, 清政府急需将其治国思想深入到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之中。当时的统治集团则为满族, 尽管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圣祖康熙等帝王均通汉、蒙语言, 但在清朝建立之初很多臣工却不通汉语。另一方面, 清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采取一系列措施, 笼络汉、蒙人才为己所用。如沿袭明制, 继续实行科举制度, 特开设"博学鸿儒科"招募大量汉族贤士。而这些汉人又不通满语。因此,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 实现上传下达, 政令畅通,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

许多文书都用双语书写。其次, 满族统治者也急于学习其他各民族主要是汉族较先进的思想、文化, 了解各民族的思想观念。因此, 在清初就开始重新汉文典籍的翻译工作。天聪三年(1629) , 清太宗设立文馆, 令达海、刚林等人翻译汉书。《刑部会典》、《素书》、《三略》、《宝全书》等满译本都是达海完成的。入关后, 翻译汉书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规模也不断扩大, 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在这些翻译文献中有许多为满汉合璧文献。再次, 随着清朝的统一, 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加之政府开明的民族政策, 各民族间交往进一步加深, 各民族民间的文化、思想交流也不断深化。为大量的合璧文献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最后, 作为"国语"、"清文"的满语文在清代为官方语言文字, 曾经在蒙、汉、藏、回等各民族语言中起过媒介作用,[19] 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这是多语种合璧文献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满文文献的内容特征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 而文献所记录的内容, 则可体现其内在价值。作为历史文献的满文文献更是如此。正如其他历史文献一样, 满文文献充分反映了满族从地处祖国东北一隅的小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直至挺进中原, 君临天下, 统治中国达 200 多年的辉煌历史。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 满文文献在内容上最明显的特征是时代性, 即不同时代的文献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早期满文文献主要以政治、军事类为主。所谓早期, 主要指满族自满文创制至满族入关前的这一阶段。在入关前, 满族主要是致力于本民族军事力量的壮大和领土的扩充, 当然也包括为建立一个政权所需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本制度的构建, 一切以统一大业为中心。在文献中反映为与政治(主要是帝王) 、军事相关内容占主要成分, 且以官方文档居多。如《满文老档》"记载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 建立后金政权, 而后对明朝政府进行战争, 夺取辽东, 并数次深入关内, 屡挫明师等军政大事。"[20]《清太宗朝战绩功录》(老满文写成)[21] 也是对皇太极战绩的记录。同时这些文献也记载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组织、法律规章、生产和经济状况、风俗、天文地理等情况。

2. 中期满文文献内容广泛, 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一时期主要指入关后至乾隆朝中期以前满语文最为盛行的阶段。

在政治上, 随着全国的统一和新政权的初步建立, 统治者将主要目标定在各种制度的完善和政权的稳定上。因此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文献大量产生, 皇帝的圣训、谕旨等也不断问世。如《顺治十二年上谕吏部谕旨》、《康熙上谕》(康熙八年至二十四年谕各部院衙门) 、《钦定吏部铨选官员则例》(雍正三年殿刻本) 、《钦定吏部则例》(乾隆七年殿刻本) 等等。[22]

在军事上, 不仅有具体战事的论述文献, 如《平定三逆方略》(康熙二十五年稿本) 、《平定察哈尔方略》(康熙年间精写本) 、《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三十五年殿刻本) 等, 而且有一些军事理论典籍, 主要是译自汉文, 如《六韬三略》(顺治年间抄本) 、《黄石公素书》(康熙四十三年刻本) 、《孙吴子兵法》(康熙年间京都天绘阁刻本) 等。此外还有一些军事制度的著述, 如《钦定兵部事务则例》(乾隆七年殿刻本) 、《军令军律》(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23]

在文化上, 文献的内容也十分丰富。首先, 满文在推广使用之初, 最亟需解决的是学习和普及问题。因此, 大量的学习满文用的材料、工具书便应运而生。如《清书十二字头》(康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

熙二十八年听松楼刻本)、《清文启蒙》(雍正八年三槐堂序刊本)、《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殿刻本)等。其次,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日趋繁荣起来。不仅有大量的翻译作品,而且出现了不少满文作品,如《平山冷燕》(荻岸散人著)、《妇莲梦》(苏奄主人撰)等。[24] 再者,满族统治者为了进一步了解汉民族、汉文化,学习其先进的思想文化,将反映汉民族思想精华的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如《四书》(康熙三十年玉树堂刻本、乾隆六年殿刻本)、《性理》(雍正十年墨华堂刻本)、《易经》(乾隆三十年殿刻本)等。[25] 此外满文创制已有四十多年,使用满文为书写工具已逐渐被满族旗人所接受,同时,经过改制后的满语文在读音、书写和语法上也日趋完善,方便广大群众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满语,因而也扩充了满文文献的内容和数量。

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地理方面也有一些地图及志稿文献,如《盛京舆图纪事》(存卷三至卷七,乾隆年间稿本)、《钦定西域同文志》(乾隆十五年殿刻本、乾隆二十八年殿刻本)等。数学方面的《几何原本》可谓经典之作。在医学领域也有一定的文献。这些文献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

3. 晚期的满文文献在数量上不多,涉及内容也相对较少。这一时期主要指嘉庆至光绪朝。虽然这一时期的满文文献包括政治、法律、文学等方面内容,但数量有限,与中期文献相比已大为逊色,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为对早期或中期满文文献的再版或重刻(印)。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满汉民族的融合,满语文的地位逐渐下降,直至被汉语文所取代。这也正反映了当时满民族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吸收。

注:

①王余光著,《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页。

②熊笃,许廷桂编著,《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 页。

③、④杜泽逊撰,《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 4、132 页。

⑤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1 页。

⑥、18、21、22、23 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 年版。

⑦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60 页。

⑧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1—14 页。

⑨黄裳著,《清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0 页。

10、25 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版。

11、17 卢秀丽、阎向东编著,《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

12 黄镇伟著,《纺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3 页。

13、15、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 1196、1 页。

14 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著,《满语研究通论》,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 页

19 金启宗,张佳生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66 页。

【责任编辑　张佳生】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